

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简史

(初 稿)

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专业

1972年5月

目 录

第一阶段（廿世纪初期）：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和印尼共产党的成立.....	1
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1
二、印尼共产党的成立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9
三、1926年武装大起义.....	15
四、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和七省舰起义.....	22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抗日斗争.....26

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6
二、日本侵占印尼和印尼人民的抗日斗争.....	28

第三阶段（战后到1951年）：八月革命的爆发和

茉莉芬事件.....	33
一、八月革命的爆发和印尼共和国的成立.....	33
二、反干涉反颠覆和反殖民复辟.....	40
三、革命的《新道路》.....	47
四、反革命茉莉芬事件.....	57
五、第二次殖民战争和圆桌会议协定.....	63
六、动荡的年代.....	69

第四阶段（1954年亚非会议前后）：反帝反殖斗争

的高涨.....	74
一、从血泊中爬起来又举起反帝旗帜.....	74
二、印尼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80

三、进步力量逐渐壮大	85
四、亚非会议	89
五、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91
六、第一次普选	94
七、苏加诺方案和有领导的民主	99
八、收复西伊里安运动	102
九、反革命事件“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	109
十、反华排华逆流	115
十一、《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	118
十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123
第五阶段（1965年“九卅事件”——迄今）：	
血的教训：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130
一、“九卅事件”	130
二、苏哈托法西斯统治	14
三、《自我批评》	154
四、走武装斗争道路	160

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简史

第一阶段（廿世纪初期）： 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印尼 共产党的成立

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三百年来荷兰殖民主义者侵略印尼的过程，就是印尼人民反殖民斗争的过程。从十六世纪末荷兰海盗前来印尼掠夺香料（胡椒、豆蔻、丁香），霸占土地，奴役人民，直到廿世纪，印尼人民的反殖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荷兰殖民经济的历史展示了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杀戮和卑鄙行为的无法比拟的图画。”“他们足迹达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变成一片荒野，杳无人烟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52页和第950页）。印尼人民英勇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例如十七世纪奴隶出身的苏罗巴蒂（Suropati），率领饱受殖民者虐待的奴隶和丧失土地无以为生的农民，起来同荷兰殖民者

血战数载，最后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他的儿子踏着他父亲的血迹奋勇杀敌。又如1817年巴迪慕拉（Pattimura）率领安汶人民奋起抗击荷兰殖民者在香料群岛肆无忌惮地掠夺丁香和豆蔻。巴迪慕拉在战斗中被捕，英勇不屈，昂首就义，高呼“被砍倒的丁香树一定会再长出新芽来，老的巴迪慕拉倒下去了，新生一代的巴迪慕拉一定会纷纷站起来。”事实正是这样，安汶人民的反荷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1825年爪哇人民在蒂博尼哥罗（Diponegoro）领导下爆发了强大的人民武装起义，战斗继续了五年，给殖民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十九世纪末苏门答腊北部人民武装抗荷，进行持久战，奋战四十多年，充分表现了印尼人民的英勇气概。印尼人民的抗荷斗争，发展到了廿世纪初叶，有了新的阶级内容，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斗争形式。它高举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明确提出要求国家独立。这时的领导阶级已不象廿世纪前几次比较大规模的抗荷斗争那样，由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封建贵族来领导，而是由新生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了。斗争的形式，也和廿世纪前大不相同。它由自发的成为有领导的；由个人领导的成为由政党领导的；由地方性的局部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运动。总之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是印尼人民反荷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兴起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

印尼工人阶级是伴随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经营企业而产生的。正象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的：“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阔殖民地和依赖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横蛮的剥削与最无人道的压迫。榨取额外利润，就是这种剥削与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阶

级的出现，本地知识界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种‘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十九世纪下半期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榨取更大的利润，在印尼开采锡矿；设立农产品加工厂（主要是糖厂），修建铁路（1870年建立印尼第一条铁路：三宝垄至泗水），运输农产品和倾销工业品，濬疏海港，建筑码头，等等。到了廿世纪，印尼新的阶级：工人阶级产生了，此外其前身是商人、地主和官宦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也形成了。据统计，1840年爪哇已有靛兰工厂749个，工人20万以上。在以后的年代里，糖厂代替了靛兰厂而居于首位。到了1870年爪哇糖厂已有100个。1900年印尼各种企业中有2,306台蒸汽锅炉，其中绝大部分在爪哇。设置蒸汽锅炉的工厂以糖厂为最多，占一半以上。1900年以后，各工厂的蒸汽锅炉数迅速增加，反映了现代工业工人的迅速增长。到了1924年爪哇糖厂工人已有五万一千人。据1930年人口统计，印尼居民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约六百万人，其中现代工业工人七十万人。廿世纪初期，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花裙厂、丁香烟厂工人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铁路工会

爪哇铁路工人最早组织起来同荷兰帝国主义斗争。印尼全国铁路四分之三分布在爪哇岛上，工人集中在大城市里，和现代工业有紧密联系，受压迫很深，政治觉悟较高。早在1905年爪哇铁路工人成立了印尼第一个工会：“国营铁路工会”(S.S.Bond)，这个工会的会员除了印尼职工，还有在铁路局工作的荷兰职工参加。工会成员大部分是中上层职员，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当时的斗争仅仅是经济斗争，要求改善生活，提高工资，没有进一步提高到政治斗争上来。到了1908年爪哇工人在三

宝垄成立第二个铁路工会，叫做“铁路职工联合会”(V.S.T.P.)。这个工会比前几年成立的国营铁路工会规模大，成员包括国营和私营铁路工人，它不仅团结了中上层职工，更重要的是团结了广大的基层群众，作为工会的基本力量，对荷兰帝国主义开展斗争，成为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工人组织。这个工会的成员，有许多后来加入印尼共产党，成为党的骨干，因此这个工会起了为印尼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作用。

资产阶级政党——
伊斯兰教联盟

荷兰殖民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挠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它以印尼封建主为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力图保持封建关系，采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剥削形式，对印尼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阻碍了印尼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自从1870年殖民政策改变，废除国家垄断制度，容许私人资本到印尼开辟种植园开采矿产设立工厂之后，资本主义逐渐渗入印尼社会，使封建社会解体，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工业，印尼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到了二十世纪初叶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印尼资产阶级经营的种植园有显著的增加，例如1910年印尼人经营的种植园已占全国种植园的21.2%，到了1925年增加到28.6%。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爪哇经营的雇佣工人六个以上的工厂，在二十世纪已达数百家（1925年统计：印尼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经营的工厂共计865家），其中最多和最大的是花裙厂。花裙(Batik)俗称“纱笼”，是印尼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品。劳动人民用蜡染法，在白布上用蜡描绘或用铜模蘸蜡烙印花卉鸟兽图案，印染成色彩鲜艳的花裙和布料。花裙业在廿世纪初叶迅速发展，印

尼花裙厂主和花裙商人同外国花裙厂主、花裙商人在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剧烈，这种竞争促使印尼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高涨。斯大林说：“**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印尼花裙厂集中于梭罗、日惹地区，这两地区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11年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911年梭罗大花裙厂主兼大花裙商沙曼胡迪 (H.Samanhudi) 发起组织“**伊斯兰教商业联盟**”，次年改名为“**伊斯兰教联盟**” (Serikat Dagang 简称 S.I.)，这个组织代表印尼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发展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业和小工业（尤其是花裙业），它提出了“穆斯林团结起来实行互助合作”的口号，维护伊斯兰教徒的利益，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由于印尼资产阶级的软弱，反殖民主义斗争是不坚决的，一旦遭到殖民政府的镇压，便畏缩不前。1913年伊斯兰教联盟在泗水召开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卓格罗阿米诺多 (H.U.S.Tjokroaminoto) 说：“**伊斯兰教联盟并不象许多人所说的是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有人说我们将制造骚乱，这是不正确的，有人说我们将举行武装斗争，这也是不正确的。**”伊斯兰教联盟领导人如此软弱，引起基层群众的不满，有的地方分会不理中央领导的错误方针，自行采取行动，举行罢工和领导农民抗税，同殖民主义者展开斗争。

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亚洲的觉醒。”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与1905年的俄国运动最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亚洲底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底开端，标志了在廿世纪所揭开的**

全世界历史底一个新阶段。”列宁说：“随着1905年的俄国运动，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荡是在增长着。有趣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囊括了荷属印度、爪哇以及有将近四千万人口的其他荷属殖民地群岛。这个民主运动底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中间兴起了在回教旗帜之下的民族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熟悉当地风土气候的欧洲人中间造成了本地的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是主张荷属印度底独立的。第三，是爪哇和其他群岛上的很多华侨从本国带来了革命。”

中国辛亥革命对印尼产生了影响。印尼华侨和印尼人民并肩抗荷。例如1911年勿里洞锡矿工人罢工，华工和印尼工人一起战斗。1947年勿里洞锡矿的华工又和印尼工友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坚持斗争，罢工一百零五天，终于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人民为反对荷兰殖民复辟而进行英勇的保卫民族独立的卫国战争，在这场斗争中，广大华侨紧紧地站在印尼革命人民一边，不仅从道义上物质上尽力给予支持，而且还有不少华侨加入战斗行列，和印尼人民并肩作战，流血牺牲。

苏加诺在谈到中国辛亥革命对他的影响时，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使他不再相信殖民主义御用学者给他灌输的反动的世界主义思想，使他坚决地为争取印尼民族独立而斗争。（见《苏加诺演讲集》第14页）。

印尼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时，知识分子的民族启蒙运动起了开路先锋和桥梁作用。知识分子对政治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启蒙运动对于唤醒群众，提高人民政治觉悟起了一定的作用。卡尔蒂妮（R.A.Kartini）是妇女运动的先驱，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卡尔蒂妮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是东爪

哇札巴拉 (Djabara) 县长，母亲原为贫困的种植园女工，后被县长纳为妾，地位卑贱。卡尔蒂妮从十二岁起就被深锁闺中，对封建压迫有切身体会。她从1900年起就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反对旧式婚姻，要求男女平等，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她在札巴拉创办印尼第一所女子学校。卡尔蒂妮反对殖民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她在1898年12月21日出版的《荷兰百合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万分同情社会主义者的斗争，……阿姆斯特丹（荷兰最大城市）最大的坏蛋不是住在贫民窟里，而是住在绅士帝王街（荷兰大资本家所在地）”。她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荷兰人不喜欢我们爪哇人有所进步，因为爪哇人有了知识之后，那末对于殖民政府所说的话，就不会唯命是听了。”

“菩提务多摩”

印尼知识分子进行启蒙运动，大力宣传教育救国论，要求学习西方文化，发展农业、技术和工业，复兴爪哇的艺术和科学。年老退休的哇希丁 (Wahidin Sudirohusodo) 医生，为此到爪哇各地奔走，发表演说，宣传教育救国，筹募教育基金，资助清贫学子继续深造。他的呼吁，得到雅加达医学院学生的热烈拥护。1908年5月20日在雅加达成立了“菩提务多摩” (Budi Utomo意为“优良的品质”，有人译作“至善社”)。“菩提务多摩”的成立，意味着印尼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把它成立的日期定为“民族复兴节”。菩提务多摩宣传教育救国，进行文化启蒙运动，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拥护，各地纷纷组织分会，拥有一万名左右的成员。

印尼协会

印尼留荷学生在1908年在荷兰组织“印尼协会”(Perhimpunan Indonesia)。

这个协会后来发展成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左翼政党，明确提出“争取印尼独立”的口号，同殖民主义者划清界线，坚决不和殖民主义者“合作”，宣传印尼人民要有自信心，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留学归国后，在万隆、泗水等地成立“研究会”(Studi Club)，研究印尼革命问题，宣传民族主义，为1927年成立的印尼民族党(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准备了条件。

东印度党

在印尼居住的荷兰人中有所谓“土生荷人者”(Indo)，即荷兰人与印尼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种人为数甚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印尼的24万荷兰人中有21万是土生荷人，他们受到来自荷兰的殖民者的种种歧视，例如他们的工作虽然与来自欧洲的荷兰人相同，但待遇却低得多，他们虽有才干，亦不许担任高级职务，他们虽然在印尼生长，亦不许购买土地。因此，他们对于殖民政府不满。1912年以陶威斯·德克尔(E. F. E. Douwes Dekker)为首的土生荷人，在万隆组织了东印度党(Indische Partij)，提出了“东印度是东印度人的”口号。所谓东印度人，包括一切在印尼生长的以印尼为祖国的各族人民，即包括土生荷人、印尼人、华侨、阿拉伯侨民和印度侨民，等等，所有东印度人，不分民族，一律平等。陶威斯·德克尔在成立大会上说：东印度党的成立，意味着“纳税的殖民地奴隶向征税的殖民王国宣战”。东印度党的号召得到印尼居民的热烈拥护，印尼独立运动著名领袖德宛陶罗(Ki Hadjar Dewantoro)、吉普多·莽贡古苏摩(Tjipto

Mangunkusumo) 参加了这个组织，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而斗争。

荷兰殖民政府对于这个为争取印尼独立而斗争的政党，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它。1913年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筹备庆祝荷兰独立（摆脱法国拿破仑统治）一百周年纪念，要求印尼人捐献参加庆祝活动。德宛陶罗写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荷兰人》的文章，提出抗议，他说：“命令印尼人捐献庆祝荷兰独立，这简直是对印尼人民的侮辱！”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印尼人民热烈的共鸣，但却遭到殖民者报刊的漫骂侮辱。殖民政府以此为借口，说德宛陶罗“扰乱治安”，实行逮捕，驱逐出境，接着东印度党其他领导人亦相继被驱逐出境，东印度党被迫解散了。

印尼人民的政治斗争虽然遭到殖民政府的野蛮镇压，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它象一股洪流，其势迅猛，它将冲倒一切障碍，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

二、印尼共产党的成立 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印尼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时，各阶级提出了不同的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有的提出了“教育救国论”，有的以“伊斯兰教”教义为指导思想。那时的工人运动还处于单纯地进行经济斗争的阶段，印尼革命实践还没有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到了1914年印尼革命知识分子和在印尼的荷兰革命知识分子共同组织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ndische Sociaal

Demoratische Vereniging)，这是印尼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政党，是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它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为印尼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明确提出了“争取印尼独立”的号召，指出了革命的动力来自广大的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人民、工人和农民以及一切民族和宗教”，“以社会主义知识教育人民。”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在各地建立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教育工人和组织工人。在农村方面组织合作社，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斗争。此外还出版报刊，宣传社会主义，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并且参加各种代议机构的选举并在代议机构中进行斗争。

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企图把印尼革命具体实践和马列主义真理结合起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在组织工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立了各种专业工会。在农村方面亦积极展开工作，首先是通过“伊斯兰教联盟”对农民宣传教育，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建立革命核心，同改良派争夺领导权。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帝国主义为了重新分割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大战期间，荷兰尽管是中立国，但也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印尼丧失了欧洲大部分市场，海上交通受阻，从而使印尼对荷兰的输出入额减少了十分之七。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却趁此机会大力打进印尼，美国逐渐成为印尼输出的大主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尼的农产品滞销，价格暴跌，种植园缩小种植面积，裁员减薪；另一方面舶来品价格飞涨，粮食和日用品也跟着猛涨，人民生活日益困难，群众对殖民统治日益不满，从而使反殖民主义斗争加强起来，不断爆发了罢工和农民起义。东爪哇南旺（Rembang）地区农民对殖民者进行武装斗争；牙律（Garut）农民展开

反抗殖民政府强迫低价征购大米的斗争；三宝垄居民举行一万群众参加的示威大游行；苏拉威西中部地区托里托里(Toti-Toti)农民，不顾殖民者的威逼利诱，抗拒承担无劳动，在斗争中打死了几个官吏；占卑和巨港居民武力抗争，加里曼丹也爆发了农民反抗斗争。

印尼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时，

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十月革命对印尼人民革命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东印度社民主联盟机关报《自由呼声》发表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大胜利，“俄国胜利的钟声，在这个国家的城市和乡村中听得到。在这里，人民痛苦地生活着，整个世纪的人民都困苦之中。……我们大家不是听到了胜利的钟声吗？继续斗争，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爪哇和东印度人民将赢得象俄国人民的‘胜利’那样的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印尼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印尼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各地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工人运动联合会”，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统一指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群众迫切要求自己的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最高组织形式，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因此在列宁提出每个工人阶级政党采用共产党这一名称的号召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三宝

垄支部提出建议，在1920年5月23日举行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将党的名称改为“印尼共产党”。这个改变党的名称的提案，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哈尔托 (Hartogh) 为首的反对派，反对改变党的名称，他们认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是一切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柏斯玛 (Bergsma) 为首的马克斯主义者严厉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指出反对派的论调同背叛革命的德国“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同一鼻孔出气，指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实质上早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改变名称，可以更明地揭示奋斗目标。辩论结果赞成改名的占大多数，于是印尼共产党就此诞生了。印尼共产党为了响应马克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在1920年12月加入第三共产国际，和兄弟党并肩作战，为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而奋斗。1924年5月红色国际总工会在广州召开太平洋区运输工人会议，印尼共产党派遣阿里明 (Alimin)、甫迪苏基特罗 (Budisutjito) 参加，他们除了出席会议，还会见了孙中山。

印尼共产党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宣传鼓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出版了各种报刊，例如中央一级的有：《人民之声》(Suara Rakjat)、《公报》(Communique)；地方性的如：雅加达的《火焰》(Njala)，三宝垄的《火》(Api)，泗水的《无产者》(Proletar)，苏门答腊的《斗士》(Djao-djago)，坤甸的《勇敢》(Berani) 等等。

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

印尼共产党是“时代的产儿”，它是在革命高涨的形势

下诞生的，是在人民、首先是工人反抗日益残酷的殖民压迫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诞生的。“战后连年饥荒，普遍贫穷，困难到了极点，人民的反抗情绪也愈高涨。”（印尼总工会编：《印尼工人运动史》）工人的生活条件愈来愈恶劣，技术工人每周工作88小时，收入只有15.17盾，在这样微薄的工资中，还要扣除25%向政府纳税。舶来品价格日益高涨，工人的实际工资日益降低，而外国垄断资本家却在这年头残酷剥削工人，获得惊人利润，例如东爪哇糖业垄断组织“阿姆斯特丹商业公司”，在1916年分发股东红利高达50%，到了1920年增加到60%。

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尼共产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1920年糖业工会向种植园经理部和糖业辛迪加发出通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些要求都被资方无理拒绝了。东爪哇和西爪哇数万糖业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迫使糖业辛迪加不得不和工人坐下来谈判。由于阿姆斯特丹商业公司负责人态度蛮横，拒不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糖业工会发出罢工的号召，糖厂生产停顿。殖民政府为了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起而干涉，颁布禁止罢工法令，逮捕工人领袖，但是它也害怕罢工继续扩大，不得不“提醒资方最好增加工资”，以免激起更大的罢工运动。这说明罢工是和资本家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1920年8月私营三宝垄、井里汶铁路工人罢工，要求给予和国营铁路工人的同等待遇，每日工作八小时。同年9月日里铁道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同月火水山（Pangkalanberandan）巴达夫石油公司（B. P. M. = Bataafse Petroleum Maatschappij）工人罢工，11月泗水船坞工人罢工。此外一些企业部门的工人也举行罢工。

1921年爆发了三宝垄荷兰印刷厂工人罢工，同年爆发了

糖业工人总罢工。1922年官办典当业工人反对种族歧视举行罢工。1923年爪哇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万铁路工人有一万三千八参加，而且参加罢工的不仅印尼工人，欧籍职工也参加罢工，规模之大是印尼工运中罕见的。1920年至1923的罢工，一般是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荷兰殖民政府万分惶恐，它采用两种手法来对付工人运动：第一是用大棒来镇压，颁布罢工条例禁止罢工，逮捕和驱逐工人领袖，箝制言论，对进步报刊进行严格检查。有一时期在一周内有三十个出版机关被搜查；第二是施展阴谋诡计，进行分裂活动，在总工会内部挑拨离间，使总工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组织。在伊斯兰教联盟中则支持改良派，反对革命派，结果改良派在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不许跨党”的决议，把在伊斯兰教联盟中积极活动的共产党员排除出去，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印共“三大” 在这情况下，印尼共产党在1924年12月在日惹（Jogja）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大”在1921年在三宝垄召开，“二大”在1924年在雅加达召开），当时的党员共计1,140人，大会由阿里明担任主席。他在会上做了关于参加太平洋区运输工人会议的报告，大大鼓舞了工人同志的斗志。大会讨论了“人民同盟”（Serikat Rakjat）问题。“人民同盟”是党的外围组织，其基本群众是农民，成员有三万一千人。大会决议：把“人民同盟”和共产党分开来，成为独立的组织，有自己的纲领，放弃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大会还作出决议：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没有认识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必须动员千百万